

##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在日朝鲜人 和“三一”独立运动

[日] 今中比吕志  
冯 玮 译

在迎接战争结束 50 周年之际,日本的新闻传播媒介,出现了试图重新审视始于 1931 年的中日战争和 1941 年的太平洋战争意义的动向。例如,《中央公论》1 月号出了《那场战争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特集;《世界》2 月号也出了《亚洲的百年和日本》特集。面对这一动向,我认为我们日本人在回顾 15 年战争史的同时,有必要通过对战前被强制押送到日本,在民族歧视和压迫下被迫服苦役,有时被残杀的在日朝鲜人的苦难的了解,来加深对日本帝国主义向亚洲各国国民发动侵略战争的认识,以及对自身责任的认识。另外,在论述战后日本和平民主的发展时,作为其前提,我们首先必须对在天皇制国家权力的残酷镇压下,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争取殖民地解放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在日朝鲜人战前反抗的历史,进行正确的认识和评价。而且,在战后 50 周年的今天,如果对深受祖国——朝鲜半岛的分裂和日本国内民族歧视和偏见之苦的在日朝鲜人的民族问题缺乏国际性理解,那么,同亚洲各国构筑面向 21 世纪的和平、

友好的国际关系,将是相当困难的。

对于战前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在日朝鲜人问题的科学的历史学研究,由于为言论和学术研究自由提供保障的战后和平宪法的制定而成为可能,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因此得以问世。例如,以朴庆植的《关于在日朝鲜人资料集成》(1—5 卷·三一书房)、《现代史资料》26·朝鲜(2)(觅史实书房)为代表的资料集,以及朴庆植的《在日朝鲜人运动史·1·15 解放前》(三一书房)、《朝鲜“三一”独立运动》(平凡社),高俊石的《在日朝鲜人革命运动史》(1985)、梶村秀树著作集(全 6 卷·别卷 1)《在日朝鲜人论》(明石书店)等。作为最近的研究成果,则有文京洙的《在日朝鲜人眼里的“国民国家”》(历史学研究会编《探究国民国家》,青木书店),富田晶子的《“三一”运动和日本帝国主义》(鹿野政直,由井政臣编《近代日本的统合与抵抗》,日本评论社)等。

但是,可以说对于战前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在日朝鲜人问题的研究,还有不充分的侧面。也就是说,正如上面所显示的,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迄今为止大都是由在日朝鲜研究者承担的,在日本近现代史研究者所关心的各项问题中,这一问题所占的比重,是不大的。特别是日本人对于在日朝鲜人在严厉的镇压下自发展开的“三一”独立运动的历史地位及其评价的研究,是相当少的。朴庆植曾提出这样的发问:在日本,“关于在日朝鲜人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在日朝鲜人运动的研究成果鲜见发表,这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说在日朝鲜研究者迄今为止所作出的学术上的贡献,是相当大的。总之,我认为特别是关于战前日本的在日朝鲜人斗争历史及其意义的研究状况,今后有待于日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自己来重新加以认识和改变。同时,这也将是今后通过日韩两国历史研究者

共同研究的进展,能够加以阐明的课题。

## 二

由于 1945 年的战败,对亚洲各国人民造成难以估量的巨大牺牲和灾难的日本绝对主义天皇制国家权力崩溃了。日本“决意不再引发因政府行为而造成的惨祸”,并采纳了以国民主权、非武装和平主义、议会制民主主义为轴心的新的和平宪法。在保障学问研究自由的这一和平宪法制定后,战后日本科学的历史学者,通过和在日朝鲜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各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进行殖民地统治的实证性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实际上单独支配战后日本政治的自民党政府却一贯否认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现在的联合政府村山富市首相也同样持这种态度。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在去年永野茂门法务相和樱井新环境厅长官的发言中所看到的,在日本人中间,目前仍然存在着“15 年战争不是以侵略为目的,而是以解放亚洲殖民地为目的的战争”这种冒犯和亵渎亚洲各国人民的错误认识。今年,即 1995 年 1 月 31 日,由自民党国会议员结成的“终战 50 周年国会议员联盟”(会长奥野诚亮,盟员 143 名),制定了如下活动方针:“(对亚洲各国)反省、谢罪和不战的(国会)决议,是一份意在承认战后对以往历史的歪曲认识的决议,而不是一份认为这种歪曲认识给我国的前途栽下祸根的决议。”对最近日本的这种政治动向,《朝日新闻》1995 年 2 月 1 日发表的社论,不得不联系文艺春秋社发行的月刊《马可波罗》中写有“纳粹没有毒气室”那篇受到舆论谴责的报道,提出如下看法:“和对过去作出较为严格的反省的德国相反,在日本,将以往的所作所为正当化,以及作自我辩解的风潮相当强烈。日本

人总是认为,过去是迫不得已,且并没有犯下那么大的罪孽。”

在战争结束 50 周年的今天,出现了肯定日本以往的侵略战争,否定战后科学的历史学研究成果的上述种种“风潮”中,可以说日本的历史科学正站立在一块重大的试金石上。不过,不仅不被日本国民,而且也不被亚洲各国国民普遍认为正确的“风潮”,最终或许不得不因失道寡助而结束。所以,特别就本论文的课题而言,关于作为战前的“殖民地民族”的在日朝鲜人所受到的歧视和压迫,以及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发动的侵略战争和进行殖民地统治的问题,越发需要日本、朝鲜和中国的研究者相互协作,共同研究,通过实证性的科学研究的深化来加以解决。我认为,今后只有通过亚洲各国的研究者之间国际性的共同研究,才有可能使走向 21 世纪的东北亚国际关系进入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在日朝鲜人的实证性研究,迄今为止也是根据所发现的关于关东大地震时对朝鲜人的残杀事件、强行押送、强制劳动、慰安妇、征兵动员等问题的资料进行的。

首先,在日朝鲜人的形成,同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殖民地统治具有密切关系。这是谁也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日本政府在 1910 年实行“日韩合并”后,在汉城设立了朝鲜总督府,开始了殖民地经营。总督府以“土地调查”(1910 年)的名义,剥夺了 200 多万农民的土地;以“朝鲜教育令”(1911 年 8 月)为依据,抹杀了民族教育;通过制定“朝鲜会社令”(1910 年 12 月),压迫民族资本,对朝鲜实施了残酷的殖民地政策。结果,被剥夺了土地的大批农民,作为劳工来到了日本。在日朝鲜人 1913 年为 3635 人,至 1918 年达到了 22411 人。在此之后,尽管朝鲜人进入日本受到禁止或限制,但在日朝鲜人的人数仍持续增加。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包括强行押送者在内,这一人数达到了 240 万人。

在日朝鲜人作为“殖民地民族”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战后由于资料的发现而得以揭示。例如,在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时,发生了像狩猎一样将朝鲜人当作动物的“射杀朝鲜人”事件,使许多朝鲜人和中国人被日本军人残杀。<sup>①</sup>1925年,日本当局制定了治安维持法,许多在日朝鲜留学生和工人遭到指控,被投入监狱,在警察署因遭到残酷拷问而惨死狱中。1931年因柳条湖事件而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在1932年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并在翌年开始将朝鲜人强行押送到日本。150多万从本国被强行押送到日本的朝鲜劳工,在日本各地的煤矿、矿山、军需工厂被强制“皇民化”,被迫服苦役。强行押送也包括妇女,许多妇女在工地的吃饭场所服苦役,或在军队被迫充当慰安妇。例如,在建设长野县松代的大本营地下战壕时,不仅征用了朝鲜劳工,而且征用被强行押送的女性充当慰安妇。<sup>②</sup>日本军队将朝鲜人和台湾人等“殖民地民族”,作为进行亚洲侵略战争的“人的资源”加以利用。

上述资料的发现和以上述资料为基础的科学的历史学研究成果,必然要对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提出关于战争责任的质问。因此,在战后50周年的今日,日本政府不对成为侵略战争牺牲品的朝鲜人承担国家责任、国家保障,在外国人登录法、出入国管理法、日韩基本条约(1965)等法规和条约中对在日朝鲜人采取歧视和压制态度等问题,都不能不特别受到亚洲各国国民的国际性批评。

### 三

在日朝鲜人即使在日本法西斯化绝对主义天皇制权力的残酷镇压下,仍然勇敢地展开了使殖民地化的祖国获得民族解放

和独立的斗争。另外,他们还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向亚洲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先进的学生、工人一起,展开了共同斗争。其中的一个侧面,就是由日本的在日朝鲜学生和工人展开的“三一”独立运动。

“三一”独立运动,本来是“日韩合并条约”以后,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朝鲜人民首次正式展开的民族解放斗争。其发展的过程是:1919年3月1日,在汉城的塔城公园,宣读了由33个民族代表署名的《三一独立宣言书》,许多群众即刻发出了“朝鲜独立万岁”的欢呼声,使集会转变成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同朝鲜总督府的宪兵发生了激烈冲突。这场运动对深受严酷的殖民地掠夺和民族歧视之苦的全各地的民众,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从3月下旬一直持续高涨到4月份,虽然最终遭到了日本军队和警察的彻底镇压,但是侨居日本、中国、俄国、美国等国家的朝鲜人,继续了这场运动,使之发展成为一场具有国际意义的运动。<sup>③</sup>

在汉城进行“三一”独立运动以前,1919年2月8日,以东京朝鲜留学生学友会为中心的在日朝鲜人,在东京神田的朝鲜基督教青年会馆举行了集会,并决议通过了《二八独立宣言书》<sup>④</sup>。据说以这份“宣言书”为导火索,最后发展成了汉城的“三一”独立运动。

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在日朝鲜人的“三一”独立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虽然仍为留学生和工人所继续,但受到了警察当局更加严厉的镇压。翻阅一下《特高月报》(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我们还可以了解到,20世纪30年代的独立运动,由于警察的镇压,处在更严峻的形势下。1930年12月下旬,东京的日本反帝同盟书记局呼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朝鲜、台湾独立”。同年同月,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为了纪念3月1日万

岁事件,呼吁“日朝劳动者实现革命的联合”。在大阪,日本化学劳动组合和反帝同盟全国协议会散发传单,提出“3月1日是朝鲜独立万岁纪念日”!“以示威游行来进行争取殖民地独立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33年8月的《特高月报》曾这样写道:“在京的极左朝鲜人,不屈服于警视厅不间断的起诉,他们在民族意识的驱动下,梦想着朝鲜的独立,经常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为中心,持续展开执拗果敢的斗争。”在《特高月报》的《在日朝鲜人运动状况》记载中,我们没有发现有关1935年以后“三一”独立运动的报道。但是,根据前面提到的朴庆植和高峻石等人的研究,他们的反帝抗日抵抗运动以“平安团体”和“乌里朝鲜独立团体”等秘密组织形式,直至战争结束一直持续开展着非法的活动。在1932至1935年,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指控的在日朝鲜人,达到了4858人。但是,正如朴庆植所指出的,“和日本人的共同斗争,仅局限于一小部分,在总体上并没有展开”。<sup>⑥</sup>然而,即使是一部分,实际上进行了怎样的共同斗争,仍是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运动之所以没有发展成和日本的工人、学生共同进行的范围广泛的斗争,其最重要的原因不仅是由于警察当局的严厉镇压,以及共产党错误的组织方针(根据“一国一党”的基本原则,朝鲜共产党日本支部于1931年解散;在日朝鲜劳动总同盟于1930年并入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同时还由于在战前日本人的普遍意识中,存在着由排他性的、天皇中心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和培植起来的日本民族对亚洲其他民族的优越心理,以及与之互为表里的对朝鲜人的民族歧视心理(八纮一宇关于大东亚共荣圈等以统治殖民地为目的的侵略性的、虚伪的意识形态)。这种前近代的民族歧视心理,阻碍了在日朝鲜人所要求的同日本工人、学生的国际性联合行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认为,日本人的这种心理,对日本帝

国主义发动的侵略亚洲的战争,起了积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 四

在美苏结束冷战的今天,人们正探求在走向21世纪的亚洲各国之间如何重新构筑新型国际关系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澄清有关过去的在日朝鲜人问题的来龙去脉。若站在肯定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各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拒绝对亚洲各国众多的牺牲者表示谢罪并提供国家保障的立场上,那么我们将无法期待同走向21世纪的亚洲各国人民,建立和平友好的国际关系。然而,遗憾的是,当今日本的政治动向,正朝着有背于亚洲各国人民的期待的方向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现代日本的“风潮”,同在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下的增强自卫队、以“为国际做贡献”的名义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和以读卖新闻社为代表的、鼓吹“宪法改正论”等日本“军事大国化”的动向,不是无关的。但是,战后50年间,在和平宪法下已经形成的民众的势力,是决不允许日本重蹈覆辙的。我们日本人必须以这种和平和民主主义的能量为基础,吸取“三一”独立运动的历史教训,加深同亚洲各国国民的国际了解,为建立和平友好的国际关系而努力。

附：1930年至1945年在日朝鲜人“违反治安维持法”一览表。<sup>\*</sup>

年份	指控者数	起诉者数	暂缓起诉	保留起诉
1930		13		
1931		11		
1932	33.8	37	19	20
1933	1,820	131	84	43
1934	884	57	81	30
1935	232	12	39	24
1936	193	11	17	1
1937	144	24	59	
1938	117	18	39	
1939	50	9	54	
1940	165	12	44	
1941	293	26	58	
1942	168	73	163	
1943	218	42		
1944	153	22		
1945	83			

<sup>\*</sup>《特高月报》(内务省警保局)引自朴庆植：《在日朝鲜人运动史》第284、317页。

(作者为日本广岛大学名誉教授、金城学院大学教授)

#### 注释：

①《特集：关东大地震和残杀朝鲜人事件》，《历史评论》，1993年9月号。

② 山根昌子编：《考察松代大本营迹》，新干社。

③ 朴庆植：《朝鲜三一独立运动》，第4、6章。

④ 朴庆植：《资料集成·第1卷》，第101—103页；高峻石：《在日朝鲜人革命运动史》，第21—28页。

⑤《在日朝鲜人运动史——20世纪40年代前半期》，载《季刊·三千里》1976年第7号。